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联系与外交实践

薛 力 苗蓓蕾

摘要：中华文明的复兴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复兴。对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文明新形态的完整构建，对外是二者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与西方式文明形态的示范作用，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等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在本国之外的差别是：其实现是通过和平方式而非战争与殖民方式，协商共建共享方式而非侵占掠夺的损人利己方式。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形态的区别在于：不认为自身文明才是高等级文明并且是其他文明的未来形态，注重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多元共存，无意让自身的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观因而不推行价值观外交。在文明竞争时代，这种文明形态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更易被普遍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指引下的新时代中国外交，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贡献新形态，为现代化道路提供新路径，从四个层次和五个领域持续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发展。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外交

收稿日期：2024—02—15

作者简介：薛力（1965—），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云南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苗蓓蕾（1990—），重庆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习近平外交思想。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文化根基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YZD049）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①。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源泉，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关系。那么，“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各自的内涵是什么？两者是什么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看待新时代中国外交与这几个概念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本文试图探讨这几个问题。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由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地理、制度、民族心理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西方学者曾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对抗的，在宏观层面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存在分裂，尤其是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与西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②

这种观点受到希腊哲学“二元对立”思想^③及其滋生物“零和博弈”思维^④的影响。而基督教一神论本身就强调教徒是上帝的选民，优于非教徒，并且坚信教徒有把上帝的福音传播给非教徒、让非教徒皈依的“神圣”使命。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一神论是西方文明（主要是新教—天主教文明）的两大支柱，两者协同作用，强化了西方文明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使得这一文明中的成员偏好从对抗性的视角看问题，对异教徒的不宽容、排斥和打压等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大关键特征。这一点在新教改革与政教分离后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加以体现，譬如，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西方与非西方等的二元对立、结盟对抗、以战胜乃至消灭对手为目的的外交思维模式等依然根深蒂固。而在中国人的哲学世界中，“阴阳”虽有二元之分，却是动态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且互相转化，^⑤即使是野蛮的“夷狄”，在接受了华族文化特别是礼治秩序所包含的理念与行为方式，也可以成为文明开化的“中华”的一部分。

①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③ 以理性主义、二元对立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思想，希腊哲学是西方文明中除基督教文化之外的第二个精神支柱。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著，吕叔君译：《世界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二元对立”哲学思想见柏拉图的理型界/现象界的区分、笛卡尔对心/物的区分和康德对对应然/实然的区分等。

④ 冯·诺依曼、摩根斯坦著，王建华、顾玮琳译：《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⑤ 纪金庆：《二元对立与阴阳——世界观的冲突与调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62—172页。

从历史的角度看，周代、秦国、北魏、元代与清代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从“夷”变为“华”的过程，唐朝统治者的鲜卑血统是公认的事实，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与此同时，历史上也有“胡服骑射”、接受南匈奴内附归化等“华”包容、吸纳、融合“夷”的大量事实。从中可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本差异。个中原因主要是，西方文明更多看到差异，而中华文明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思考差异间的互动与共存，即“求同存异”。人类是休戚相关的共同体，文明的不同不意味着要互相对抗。尊重文化多样性发展是鼓励思想多样性发展的前提，是保证全人类在应对各种复杂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中国智慧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描绘蓝图。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源于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创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集成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 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以往的“现代化”将“西方式现代化”默认为模板，西方国家也认为自己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这种“现代化”不承认文明差异的重要性、不同的文明可以走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明白什么叫“各美其美，美美与共”^③，而且固守“西方中心主义”，凭借其资本和技术优势，行军事政治霸权和经济技术垄断，并热衷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与制度。经济发展上，西方一方面希望发展中国家遵循其模式，另一方面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施种种或明或暗的限制，希望把发展中国家限制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典型的如美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违背其一贯主张的市场经济原则，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大疆、抖音英文版 Tik Tok 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与实现，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唯一模式的“神话”，让其他国家和民族看到了可参照和学习的现代化新模式，也大大强化其在本民族和本文明中发展出独特现代化模式的信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与实践，也让发展中国家清晰意识到，现代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依据自己的特点推进现代化进程是可能且必须的。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

① 孙吉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第123页。

② 陈锡喜：《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的方法论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3期，第122页。

③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第18页。

态。”^①“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②“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③“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次重要讲话。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两者间的关系，从哲学层次来讲，“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表现，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表现，两者分别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次，阐释了“中国梦”与“中华文明复兴”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相对应，“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形态”相对应，两者虽然主要服务于中国，但具有外溢效应，因此会产生相应的国际效果，体现在中国外交的许多方面，从而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个外交总目标。从语言学层次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进行时（体现为第一个讲话中的“新道路”，第三个讲话中的“新图景”与第四个讲话中的“创造”——继承历史显然永远是进行时），也是阶段性的完成时（体现为第一个讲话中的“创造了”，第三次讲话中的“展现了”）。整体上，就地区与全球层面而言，属于进行时。就中国国内而言，已经大致成型，属于阶段性的完成时。因此，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将是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内涵的历史过程”，“这个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统一体”。^⑤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均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国内主要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际上主要表现为主张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和共存。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第4—14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24页。

③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第4—11页。

⑤ 孙代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9日，第11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

在国内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传承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基础上吸收各国现代化的优秀特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制度，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

在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文化、经济、安全、生态等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包容合作而非排斥对抗、交流互鉴而非区隔打压、和而不同而非强求同质化。这一系列主张都生动体现在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诸多实践中：“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外交、新型国际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三大全球倡议（特别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高度建设性和可操作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一系列理念都明显区别于西方文明形态。

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的总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需要多层次、多方位进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对比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与西方文明形态的对比显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表明中国作为一大文明、一个巨型经济体，在民族复兴与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谋求的是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复兴，是多种文明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在政治上建立不干涉内政的伙伴关系，安全上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而非战争与殖民，经济上推动全球化与互利共赢，文化上实现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生态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多民族国家，漫长的民族融合与重构的历史事实使得中华民族有着开放的民族观念和广阔的天下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中国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问题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自中国古代“天下大同”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对整个世界的关切与构想。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逻辑

就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中国与西方的国际秩序观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是文明史观塑造的国家，其构想的共同体秩序指向人而非“区域”，中国古语如“天下大同”“天下为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8—20 页。

匹夫有责”均体现了中国“天下观”的特征，中国的“天下观”处理的是基于权力一统型的普天之下的整体秩序，而西方的“国际观”处理的是基于权力多统型的民族国家间秩序，^①追求本国利益至上，缺少以世界为本位的思考与对世界秩序的追求，即缺少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思维范式。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形成的过程中，面临着多个封建邦国，为了达到共同的民族认同，凸显本民族的特质，必须树立一个敌对的“他者”。而中国自先秦时代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经历着“交往—吸收—融合—重构—再生”，并且不断重复这一进程，这种历史事实使得中华民族有着开放的民族观念和广阔的天下理念。西方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处理不同权力类型的历史经验使其形成了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理念。

在“天下”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答案不仅根源自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念，而且传承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新秩序”和“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中国外交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文明为依托，结合近代以来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经验，吸取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其他文明的积极成果，用中国智慧为全人类面临的全球治理难题提供的一把钥匙。这一理念为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创造更加美好的全人类共同家园贡献了中国力量。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中国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端，并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互相促进。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外交正是中国推动构建全球文明新形态的展示，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理念、策略与政策实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呈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精神源泉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诸子百家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源头，其中道家、儒家和佛教构成中华文明的三大主干，这三者连同法家思想，是中华文明得以赓续几千年的主要精神动力，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建设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与实践。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自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进一步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中国化，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从毛泽东时期至

^① 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第6页。

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成果。^①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具体呈现,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创新和理念创新,这一创新让其他国家看到了崭新的国际关系模式和崭新的国家发展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在世界范围内强求各国必须一致,而是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美美与共。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源泉一脉相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③,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思想的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天下大同”理念的继承发扬和新时代实践,也是对该理念的扬弃和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古代天下观中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有关人类文明秩序的合理理念,摒弃了传统“华夏中心主义”“华夷之辨”等不符合新时代实际的内容,真正促成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用中国传统智慧为人类未来的规划蓝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论,可以说,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论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指引,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道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结合新时代特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关照人类的前途命运,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实现全人类发展、繁荣和幸福为前进方向,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存在之根基,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折射出中国对人类文明多样性抱持着开放、平等和包容的态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世界上不同文明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互帮互学、交流互鉴,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各自的力量,让世界文明长河中群星闪耀,而非一家独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中,

① 薛力、苗蓓蕾:《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源泉与实践路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6期,第3—13页。

②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43页。

③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上)》,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19—420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中国的世界观和国际观一直以“平等”与“合作”为底色，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主张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②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团结合作，直到中国领导人提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③，中国在“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开始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构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进一步发展了“和谐世界”理念，让中国对未来世界的构想更加全面详实、更有着力点。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总框架指引下，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挥作用的途径包括双边、区域、全球、功能议题等四个层次以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五个领域。不同层次和领域的理念与实践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不仅仅走出了本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更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

中华文明的复兴（或者说中国梦的实现）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复兴。就国内层次而言，复兴的实现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文明新形态的完整构建；就国际层次而言，中华文明的复兴要求中国在国际上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新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与西方式文明形态的示范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在本国之外存在重大差别，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当今时代特征与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只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现代化，操作上采取的是协商共建共享方式，而不可能像西方国家历史上所做的那样，通过战争与殖民方式，也不可能采取一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侵占、掠夺发展中国家等损人利己的方式。

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形态的重大区别在于：中国不认为只有自身文明才是高等级文明，其他文明或者向自己靠拢，或者衰弱乃至灭亡。而是认为不同文明的长期共存是人类的常态，过去五百年西方文明一家独大主导世界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正在成为过去时。文明竞争时代正在到来，其特征不是西方学者指出的国际政治以文明间的冲突为主调，而是多文明之间又竞争又合作，文明间更多的是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与竞争；每个文明体对内强化文化认同，对外与其他文明或竞争或合作，虽然不排除局部冲突与战争，但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新的世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3日，第15版。

大战不大可能发生。^①文明新形态强调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多元共存，中国也无意让自身的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观，因而不推行价值观外交。新的中华文明在文明竞争时代因为其强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成为更易被普遍接受的文明形态，即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使命与任务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包括双边、区域、全球和功能议题四个层次以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领域。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四个层次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四个层次，依次是：全球、地区、双边和功能议题领域。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新时代中国外交在这后三个层次分别发力（全球层次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命运共同体由点及面、由近到远、议题广泛，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合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高级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向是全球以及全人类。习近平在 2013 年 3 月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提出。自此以来，从巴黎到纽约再到伦敦，从非洲到拉美再到欧洲，从经济到安全再到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的国际舞台上多次呼吁世界人民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③这都展示着中国在国际上始终想扮演的角色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也进一步强调和体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当前国际社会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加重，人类正处于大变局之中。在当前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需要各国领导人、政治家和外交家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协调好短期各国政治需求和全人类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为构建一个更高层次的、

① 参见薛力：《世界正进入文明竞合的长周期：亨廷顿错在哪儿？》，澎湃新闻，2022 年 1 月 12 日；薛力：《新型礼治秩序：文明竞争长周期下中国外交长期方略》，澎湃新闻，2022 年 3 月 18 日。

②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72 页。

③ 姚满林：《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四个层次》，《学习时报》，2017 年 1 月 18 日，第 2 版。

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努力。

（二）地区层次的命运共同体

第二个层次是地区命运共同体。这一命运共同体包含着中国与周边以及其他区域、地区性国际组织之间和谐共生、休戚与共的关系。

中国始终将其与所处区域以及周边邻国^①之间的关系置于最重要的位置。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强调：“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②。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③。周边国家对中国意义非凡，“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④。中国同周边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利益深度交融，自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后至今，中国已经与沿线的周边大部分国家通过“五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自2020年开始，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出中国希望以双赢、多赢和共赢的方式与周边国家分享发展的成果与红利。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地和示范区，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途。因此，中国一直不断与周边国家协同打造命运共同体，2022年5月中国外交部发布《中国关于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立场文件》，文件中提出：中方将坚定不移深化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⑤2022年1月，“中国+中亚五国”六国元首共同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⑥，这些命运共同体的建立都彰显着中国为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继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努力。

其他区域和大洲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也在持续推进。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坦桑尼亚访问时明确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在同拉丁美洲关系上，2014

① 国际关系学界将“周边”这一概念分为“大周边”和“小周边”，本文中“周边”指的是“大周边”。祁怀高和石源华认为中国的“大周边”地理范畴包括与中国陆海直接接壤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东亚这四个板块以及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详见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44页。

② 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50页。

③ 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9页。

④ 同上，第296—297页。

⑤ 《中国关于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立场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年5月30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205/t20220530_10694631.shtml，访问时间：2024年4月16日。

⑥ 《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30周年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1月26日，第2版。

年 7 月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作了以“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为题目的主旨讲话。2014 年 6 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指出：“共享，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中阿人民，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①。在同国际组织的关系上，中国注重同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建立命运共同体关系。2013 年 10 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就提出要“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② 2020 年 11 月 27 日，习近平在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③ 2015 年 7 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7 次会晤上指出：“金砖国家合作事业要繁荣昌盛，就要强本固基，打造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④ 2018 年 6 月，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指出：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⑤

（三）双边命运共同体

第三个层次是双边命运共同体，这一层次指的是中国同其他国家所构建的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双边层面的实践。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发展和升级，是比伙伴关系外交更进一步的双边关系类型，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在合作的内容上更全面，在合作的层级上更高，在合作的紧密度上也更强。^⑥ 求同存异是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实现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经贸领域的合作共赢。从 2013—2024 年，中国已与 18 个国家在双边层面上建立了命运共同体（见表 1）。

①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6 页。

② 习近平：《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1 页。

③ 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28 日，第 2 版。

④ 习近平：《打造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25 页。

⑤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41 页。

⑥ 杜哲元：《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太平洋学报》，2021 年第 3 期，第 39 页。

表 1 2013—2024 年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双边命运共同体

序号	双边命运共同体	提出时间
1	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 ^①	2014年2月
2	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 ^②	2016年5月
3	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 ^③	2019年4月
4	中国—缅甸命运共同体 ^④	2020年1月
5	中国—哈萨克斯坦命运共同体 ^⑤	2022年9月
6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命运共同体 ^⑥	2022年9月
7	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 ^⑦	2022年11月
8	中国—泰国命运共同体 ^⑧	2022年11月
9	中国—古巴命运共同体 ^⑨	2022年11月
10	中国—蒙古命运共同体 ^⑩	2022年11月
11	中国—土库曼斯坦命运共同体 ^⑪	2023年1月
12	中国—马来西亚命运共同体 ^⑫	2023年3月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深化中巴战略与经济合作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4年2月20日，第3版。

② 《中老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6年5月5日，第3版。

③ “2019年4月，两国签署《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19—202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72/sbgx_676576/，访问时间：2024年6月27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0年1月19日，第2版。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建交30周年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9月15日，第2版。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9月16日，第3版。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7日，第2版。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11月20日，第2版。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中古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11月26日，第2版。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新时代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11月29日，第2版。

⑪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1月7日，第3版。

⑫ 《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人民日报》，2023年4月1日，第1版。

续表1

13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命运共同体 ^①	2023年5月
14	中国—塔吉克斯坦命运共同体 ^②	2023年5月
15	中国—南非命运共同体 ^③	2023年8月
16	中国—越南命运共同体 ^④	2023年12月
17	中国—肯尼亚命运共同体 ^⑤	2024年1月
18	中国—塞尔维亚命运共同体 ^⑥	2024年5月

注：表格中所统计的命运共同体均为中国政府与该国有共识，并正式在双边联合声明中确认。

资料来源：本表格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唐晴2023年6月初步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席寒婷在2024年2月增补，最后由重庆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苗蓓蕾逐一核对后确定。

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比“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进一步，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织密伙伴关系网的重要举措。在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带动下，中国的外交关系由点及面铺开，为中国和共建命运共同体国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对“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的顺利推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观察发现，与中国建立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大多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有着较为积极的态度。双边命运共同体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维度发展两国关系，为推进“一带一路”的“五通”与“新三通”给予全方位保障。

（四）功能议题领域命运共同体

第四个层次是功能议题领域建立的命运共同体。除了关注与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外，中国也非常重视在各个功能议题领域建设命运共同体。双边和地区命运共同体是国家之间或者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而功能议题领域的命运共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人民日报》，2023年5月19日，第3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5月19日，第3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第2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4日，第2版。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肯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4年1月27日，第3版。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5月9日，第3版。

共同体指向的是全球所有国家。双边和地区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内涵上均有涉及，而功能议题领域的命运共同体则集中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某些特定内涵上，目前中国呼吁建立的功能议题领域的命运共同体更多的是在安全和生态领域，特别注重的是可持续发展方面。

表 2 2013 年以来中国倡议的功能议题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

序号	功能议题领域命运共同体	提出时间
1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015年12月
2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2016年4月
3	海洋命运共同体	2019年4月
4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2020年5月
5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2021年4月
6	全球发展共同体	2021年9月
7	地球生命共同体	2021年10月
8	人类安全共同体	2022年5月

注：表格中所统计的命运共同体均为官方外交场合下中国领导人正式提出的倡议。

资料来源：本表格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唐晴2023年6月初步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席寒婷在2024年2月增补，最后由重庆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苗蓓蓓逐一核对后确定。

安全议题领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内容不仅涉及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安全，也关注到新兴领域如网络空间和卫生健康。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①2016年4月习近平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号召：“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所有

^① 习近平：《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4页。

国家都要参与到核安全事务中来,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① 2020 年 5 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② 2022 年 5 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强调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③ 安全是国际社会首要关注的问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在安全议题领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立场主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内涵之一的“安全格局”这一板块着手来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变革,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夯实安全基石。

在生态方面,习近平在 2019 年 4 月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提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④ 2021 年 4 月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⑤ 2021 年 10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习近平在主旨发言中号召:“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⑥ 这些生态议题领域的命运共同体使中国与注重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有了较大的合作空间。比如欧盟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引领者,积极主导“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德法也在持续不断提升本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在打造生态议题领域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和欧盟可以携手一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挥引领作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路径和全球治理新模式。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个方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五个方面内涵: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公道正义、共享安全的安全格局、开放创新、包融互惠的发展前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

① 习近平:《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27 页。

② 习近平:《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17 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20 日,第 1 版。

④ 习近平:《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63—464 页。

⑤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4 月 23 日,第 2 版。

⑥ 习近平:《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35 页。

明交流和尊崇自然、绿色生态的生态体系，^①大致上对应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新时代中国外交通过这五方面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政治上包括建立伙伴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安全上包括全球安全倡议，经济上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文化上包括全球文明倡议，生态上有中国在全球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

（一）对外政治实践路径：伙伴关系与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的伙伴外交始于1993年，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与118个国家、6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发展形成124对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网络已经覆盖全球大部分国家。^②中国外交一直强调“结伴但不结盟”，“盟友”与“伙伴关系国”的区别在于，“盟友”缔结的根源是因为存在着被定义的“他者”，即战略对手与敌人，但“结伴”不针对第三方，并将合作共赢作为目标。“盟友”的合作领域侧重传统安全领域，包括军事、政治与安全领域，而伙伴关系的具体合作领域一般指向的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即经济、社会、文化、气候等领域。中国在构建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强调各国的平等性和独立性、注重国家之间的关系性和长久性。伙伴关系的核心是“关系性”，构建伙伴关系是为了促进合作、实现利益，但实现发展、建立和维护关系本身也是目的。^③这种不干涉内政、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是中国历代王朝推行的藩属国外交、华夷外交在新时代的创新性改造与发展，其特点包括一国一策、分亲疏但不树敌、不搞结盟对抗、注重的是长期合作效果。

习近平在2014年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④这是中国首次提出“新型国际关系”概念。“新型国际关系”之“新”，就在于摒弃了以往美西方认为国家之间必然会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可以避免国际社会出现单边霸权主义行为和强权政治思想，以开放包容的建设性路径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以协调合作的建设性方式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1—526页。

^② 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席寒婷的统计，截至2023年6月24日，在外交部网站可获得86个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国家的信息。另外16个伙伴关系国信息，以及中国与非盟的伙伴关系信息，她通过中国商务部网站、中国政府网等查到。这16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吉布提、加蓬、肯尼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苏丹、乌干达、比利时、丹麦、哥斯达黎加、澳大利亚、美国和塞舌尔。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2023年5月2日。

^③ 黄冰：《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路径——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实践为例》，《外交评论》，2023年第5期，第56页。

^④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促进国际关系的优化。^① 这让饱受冲突之苦、被霸权国家压迫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模式，为国家之间关系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明显的中国外交特色以及时代特征，其核心是“合作共赢”，其中合作是路径，共赢是目标。尽管美西方热衷于推行“小院高墙”，但我们认为，全球大部分国家赞成与支持合作共赢理念，这是通向和平与繁荣的必由之路。

（二）对外安全实践路径：全球安全倡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之下，全球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国际安全形势日益错综复杂。当前，全球安全问题处于并发症期，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相互交织，不稳定、不安全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国际安全形势明显恶化。大国地缘竞争加剧，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严峻，其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传统的军事冲突。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抛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以包容、合作、共赢的新思维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问题。

习近平剖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安全挑战，从人类前途命运出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全球安全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推动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提供了理念性公共产品，也展现了中国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全球安全倡议不仅是对以往安全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安全领域的飞跃。它植根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以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传统与智慧，准确把握人类社会规律，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把各国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破解人类安全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理念指引。全球安全倡议为“安全困境”“修昔底德陷阱”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也是对“中国威胁论”^②和“金德尔伯格陷阱”^③论最好的反驳。

（三）对外经济实践路径：“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发展倡议

2013年出台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的简称。其重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2021年中国领导人将“五通”进一步概括为“新三通”，即基础设

①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7页。

② John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10, pp. 381-396; Christopher Walker, “What Is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9, No. 3, 2018, pp. 9-23; Joseph Nye,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June 11, 2023.

③ Joseph S. Nye, JR,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The world’s Opinion Page, January 9, 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

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各国民众的“心相通”以及“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共建新目标。^①“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外首先落地的项目是推动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中国国内“要想富，先修路”发展模式在国外的实践，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外延。共建“一带一路”的项目是中国与共建国家之间在协商基础上达成的，并没有附加各种政治条件，这同发达国家的做法迥异。经过10年的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截至2023年8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当前，“一带一路”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一些海外园区项目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建设国受到当地民间组织的抵制，国际上面临“债务陷阱”和“新殖民主义”的舆论攻击，美西方对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或明或暗施加压力。为此，中国政府一方面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推进“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另一方面，一些小规模、聚焦民生和社区需求的“小而美”合作项目正在生根发芽，这些项目融入当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改善民生提升生活幸福感，以可持续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创造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如中国和非洲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创新合作模式，利用中国光伏产业优势，帮助解决非洲地区贫困家庭用电照明问题。^②同时，人文交流方面也逐渐加深，如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与周边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中马联合“送王船”联合申遗成功，让“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了文化间的对话与合作。^③中国政府援缅甸蒲甘他冰瑜佛塔修复项目中，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项目管理，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承担具体实施工作，敦煌研究院承担壁画保护信息提取技术合作项目，为支持保护研究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贡献力量。^④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实干为途径，充分聚焦具体重点领域，为解决当今世界难题和匡正全球发展新征程，提供了一份立足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实际，饱含中国智慧，浓缩新时代治国理政精华的中国方案。^⑤全球发展倡议的主要内容是“六个坚持”，它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① 习近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95页。

② 《综述：中非新能源合作让更多“小而美”项目惠及非洲》，中国一带一路网，2023—12—11，<https://www.yidaiyilu.gov.cn/p/04J86IC3.html>。

③ 《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s://www.ihchina.cn/art/detail/id/22038.html>。

④ 《中国政府援缅甸蒲甘他冰瑜佛塔修复项目举行启动仪式》，国家文物局，http://www.ncha.gov.cn/art/2022/1/8/art_722_172655.html；《共建“一带一路”打开机遇之窗 敦煌风吹向全世界》，甘肃省文化博览局，2023—10—25，<https://www.gswbj.gov.cn/a/2023/10/25/19015.html>。

⑤ 习近平：《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67—471页。

发展议程，^①具有全球的正当性，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拓展，特别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时，旨在减少与摆脱来自美西方的阻力，以便落实下一阶段按照“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新要求推进“一带一路”共建，从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明新形态的进程。

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应对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扩大等问题。全球发展协议坚持普惠包容，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指明了一条公平的道路，取代了原有的核心国家剥削外围国家而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旧的全球发展路径。全球发展倡议对接重点领域、各国需求、合作机制、各界伙伴，为缩小南北鸿沟、破解发展不平衡提出了“路线图”。^②

（四）对外文化实践路径：全球文明倡议

2023 年 3 月，习近平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内容包括四个共同倡导，^③文明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中国应对全球文明间竞争的外交方略。全球文明倡议主张的文明间交流、互鉴和包容是中国古代“君子和而不同”思想在新时代的应用，“和而不同”不仅应用于中国在国内处理 56 个民族之间关系上，也适用于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体之间的相处中。

如何实现全球文明倡议？中国是文明古国，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于世，不追求取代与效法历史上的崛起国（无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必要重新构建基于自身价值观的礼治秩序，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相兼容，具有自己的文明特色，能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并可能被一部分国家所效法。中华文明中的“无外”基因所展示出来的强大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有望构建出一个新型的礼治秩序。这个秩序有如下主要特征：这套秩序的维护以“礼”为主，以“（国际）法”为辅；这是一种圈层结构，以中国为中心，主要辐射亚欧大陆中东部；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这套体系与现有国际体系整体上兼容。全球文明倡议的实现不仅需要中国这样的国家担负起大国责任，更需要世界上不同文明国家一起共同担负起全球责任与人类文明使命，虽然每个国家在承担责任上的能力有大小。

（五）对外生态实践路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中国坚定支持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环境治理进程，

①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共同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座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外交部，2021 年 12 月 9 日，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112/t20211209_10465870.shtml。

② 李志强：《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大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 年第 7 期，第 20 页。

③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

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首批缔约国，为达成《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做出了重要贡献，认真履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国际环境条约义务，通过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构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等，积极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助力生态环保举措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双多边合作机制，广拓生态“朋友圈”，不断深化南南合作，积极推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用中国行动和中国智慧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中国在生态领域的行动和理念传承自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观，如“天人合一”“取用有节”等理念，这些理念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智力支持。

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2015年《巴黎协定》的谈判和签署以及日后的各种履约会议与机制政策制定，而且努力将它的核心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比如，结合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制定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①在2019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峰会上，中国提出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相关议题获得与会各国的广泛共识，推动世界各国重视自然途径，并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进程中。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加海洋保护区等主张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环境外交对全球环境治理所作出的重要贡献。^②从积极响应碳减排和碳中和，到主动引领内涵更为丰富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的国际角色越来越重要。

五、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相对应，“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形态”相对应。“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表现，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表现，两者分别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次，阐释了“中国梦”与“中华文明复兴”的内涵。它们在服务于中国内政的同时，也具有外溢效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三方面的精神源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人民日报》，2021年3月16日，第1版。

^②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的中国贡献》，人民网—国际频道，2019年9月25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925/c1002-31372850.html>。

文明)的优秀成果。

在“天下”观念和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论的影响下,新时代中国外交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互相促进,两者从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新时代中国外交是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展示,包括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种理念、策略与政策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四个层次:全球、地区、双边和功能议题领域,在这四个层次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命运共同体的建立由点及面、由近到远、议题广泛,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合力,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五个方面内涵: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和生态体系,大致上对应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在新时代中国外交上体现为政治上建立伙伴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安全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经济上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文化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生态上是中国在全球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

[责任编辑:李丽]